

·体育人文社会学·

全球史视角下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百年互动的脉络与逻辑

冯雅男¹, 毕天杨¹, 孙葆丽²

(1.广州体育学院 休闲体育与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00; 2.北京体育大学 冬奥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4)

摘要: 1896年首届奥运会以来, 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同行并进。重现存在却受忽视的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的漫长之路富有价值。借全球史研究互动理论视角, 通过跃迁研究单位、跨越研究边界和关注研究对象的历史联系, 剖析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3时期、7阶段, 展现其演变脉络与逻辑: 从“欧美城市领先发展与奥林匹克运动初步发展互动”“全球城市蓬勃发展与奥林匹克运动快速发展互动”到“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互动”, 经历“接触”“互动”“依赖性互动”与“形成互动机制”4层次, 其中“明线”是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之间“话语权力”的消长, “暗线”是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城市之间“优先位置”的更替。互动是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不竭动力。

关键词: 奥林匹克运动; 奥运城市; 奥运会; 全球史

中图分类号: G811.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3)02-0019-09

The process and logic of centennial interaction between Olympic cities and Olympic movement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history

FENG Yanan¹, BI Tianyang¹, SUN Baoli²

(1.School of Leisure Sports and Management, 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00, China;

2.Research Center for Winter Olympic Culture,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first Olympic games to now, the Olympic cities and Olympic movement are concurrent, which shows a long way reoccurred and also neglected,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Olympic cities and Olympic games, and a highly important value. From the theory of interaction in Global History, the research theme by transferring units, crossing boundaries and focus on historical connections, find the three periods and seven stag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Olympic cities and Olympic movement to show the process and logic. The first period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eading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and initial development of Olympic movement, and the second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lobal vigorous development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Olympic movement, and the third is Olympic cities and Olympic movement interact und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has four levels of "contact", "interaction", "interdependence" and "system". Between Olympic cities and Olympic movement, politics and economy, country and city were adjusted in the interac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is also a force for development of Olympic cities and Olympic movement.

Keywords: Olympic movement; Olympic city; Olympic games; global history

随着围拢圣火四周、象征人类团结的雪花飞升, 双奥之城北京与2022冬奥会一同载入史册。奥运城市, 国际奥委会称 Host City 或 Olympic Host City, 学

界、媒体称 Olympic City, 凡举办过奥林匹克赛事——即有完整奥林匹克经历的城市, 均为奥运城市。作为以往吸引海外学者更多关注的领域, 研究奥运城市尤

收稿日期: 2022-05-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积极城市’视角下赛后奥运城市促进大众体育参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2CTY010)。

作者简介: 冯雅男(1990-), 女, 讲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学、奥林匹克运动。E-mail: pefengyanan@163.com

通信作者: 孙葆丽

其审视其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应从集中探讨某届奥运会对某奥运城市单方向影响,走向积极探索历史流变中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相互影响。

全球史研究互动理论为阐释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百年互动提供了宏观思想指导。全球史是20世纪下半叶新兴史学分支与观念,更是研究方法。与“全球任何都研究”“全球历史罗列”等错误认识不同,其特点一是注重从全球视野观察,以跨国家、地区等边界的历史现象与进程为研究对象;二是“互动”是核心理念。在全球史探讨的10类互动关系中,“事物相

遇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便是重要的一种^[1]。在此认识下,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指的是时代背景下两者以奥林匹克赛事为主要平台,相互影响,促进各自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与过程。如何研究?史学家奥尔斯坦·迭戈指出:一是构建更大研究单元,通过“去除”边界等方法,如扩大空间规模、重新定义等;二是研究本身跨边界的对象,如环境、贸易等可在国家范围内研究但也可跨边界研究;三是关注历史联系,讨论研究单元相互影响形成的互动层次(见表1)^[2]。

表1 奥尔斯坦划分的互动层次

层次	含义
接触	事物之间相遇并发生最低强度交流
互动	事物之间持续接触,保持相互影响
依赖性互动	事物之间影响加深,出现稳定的相互依赖、共生共存
形成互动机制	事物之间协调关系,对彼此发挥良好影响

据此,笔者尝试运用全球史研究互动理论——构建更大研究单元(“奥运城市”这一超越某一举办地的更大研究单元、“奥林匹克运动”这一超越某届奥运会的更大研究单元)、研究跨边界对象(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跨越边界)和关注历史联系,以夏奥会举办城市为例,勾勒1896年以来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互动变迁:探讨逐渐递进的3时期、7阶段,对照奥尔斯坦对互动层次的划分,展现其中“接触”“互动”“依赖性互动”与“形成互动机制”的层次渐变,同时,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城市3对主要关系博弈也将浮现。

1 层次渐变:接触—互动—依赖性互动—形成互动机制

观察变迁层次需展现变迁过程。借全球史研究互动理论,基于代表性史实,1896年至今以奥运会为主要平台,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经历“欧美城市领先发展与奥林匹克运动初步发展互动”“全球城市蓬勃发展与奥林匹克运动快速发展互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互动”3时期,内含7阶段,参考奥尔斯坦互动层次理论,对应不同层次。

1.1 19世纪末至二战前:欧美城市领先发展和奥林匹克运动初步发展互动

1)阶段一(第1~3届奥运会):在“懵懂”中互动。

第1~3届奥运会于1896、1900、1904年在雅典、巴黎和圣路易斯举办,该阶段是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的开始,即“接触”层次。

一方面,奥运城市发展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产生

影响。20世纪初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走在前列,但城市制度、思想文化发展与物质文化发展不同步,人们对城市的认识停留在生存载体上,对其与体育、社会、人类的关系缺乏深入理解,办奥无充足吸引力。这一阶段,除雅典表示欢迎外,巴黎、圣路易斯观念轻视,组织混乱,实践乏善可陈,三座城市均未准备新的、固定的场馆,也未开发城市物质基础设施,奥运城市发展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影响微弱。

另一方面,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也对奥运城市发展产生影响。作为新生事物奥运会规模有限,体量微小,项目少且不固定,参与地区、国家和选手不多,影响力低,组织制度体系刚刚搭建,奥运城市选择、接洽和办奥筹备等欠缺正式、明确的行动纲领,主要依靠委员奔走商讨,无独立、专门的举办城市奥组委,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对奥运城市发展影响也很微弱。欣慰的是,使奥林匹克运动对城市发展持续发挥影响的轮流办赛机制得以确立,奥林匹克运动燃起火种。

2)阶段二(第4~9届奥运会):在“摸索”中互动。

第4~9届奥运会于1908、1912、1920、1924、1928年在伦敦、斯德哥尔摩、安特卫普、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举办。第6届因战停办。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稍有进展,迈入“互动”层次。

这一阶段奥运城市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步入正轨发挥了作用。城市开始将奥运会视为独立国际比赛,伦敦1908奥运会为分水岭:即便与世博会同年同城同选址,伦敦依然单独办奥,新建首座奥林匹克体育场,此后各奥运城市专门成立奥组委并新建独立、完整场馆,为不同项目提供场地,奥林匹克物质遗产创造客

观上拉开序幕。此时,办奥初衷主要与有识之士热爱祖国、和平的朴素愿望有关,城市奥组委、政府、精英、市民和国家层面体育组织对办奥的重视超过一些国家政府当局:英国拒绝资助1908奥运会且为与日本缓和关系迫使该国奥委会放弃与东京竞争1940奥运会举办权^[3];荷兰拒绝在阿姆斯特丹筹办1928奥运会犯难时伸出援手,奥组委秘书长罗瑟姆表示这对荷兰是难以抹去的污点^[4];法国对1924奥运会态度轻慢让顾拜旦失望:“政府眼中没奥运会,更不会利用”^[5]。这一阶段城市发展水平依然有限,办奥便可看出:场馆存在很多低级问题,也未专门、有意识地将办奥与更大范围的城市建设相联系。

这一阶段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对奥运城市发展的影响也开始萌发。一是推动奥运城市了解世界体育发展,如伦敦市民赛前认为奥运会是异域、法国风格的,办奥转变其观念;二是奥林匹克思想最早在奥运城市生根,世界政局动荡下奥林匹克运动对和平团结的倡导、对奋斗友谊的诠释被举办地市民体悟;三是国际奥委会在1912—1949奥运会期间发起了建筑比赛,启发奥运城市思考场馆建设、城市规划等议题。虽然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对城市发展的一定影响已客观存在,但早期奥林匹克运动根基不牢,很难顾及更多。顾拜旦奥运城市愿景对互动也产生影响:他亲力亲为支持城市办奥、关心城市奥林匹克空间设计、坚持奥运由不同城市组织,贡献难以磨灭,不过其认识也有局限,完美情结下的“新奥林匹亚”远离凡尘市井、隔绝烟火气息,类似神圣围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水平限制其对奥运城市发展带来更大影响。

3)阶段三(第10~11届奥运会):在“觉醒”中互动。

第10~11届奥运会于1932、1936年在洛杉矶、柏林举办,12、13届因战取消。这一阶段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延续良好势头,互动关系逐渐显现,向前推进,达到战前小高潮。

二战前无论认识或实践,城市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均已足够重视。城市从申奥起便积极准备,并有意地围绕办奥进行城市规划和设计,除场馆外奥运村、奥林匹克广场等功能建筑出现,物质基础设施扩展从点(建筑)到面(社区)。一方面城市办奥开始表露经济、政治目的。1932奥运会组织者率先将奥林匹克运动视为意识形态机会并创造体验,为柏林奥运会组织者的意识形态介入提供了先例^[6]:1932奥运会官方报告称其办奥以财富为取向^{[7]105},希特勒则粉饰办奥伪装祸心。城市及背后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奥运会的工具性并加以利用,办奥动机走向复杂。另一方面两届奥运会举办均处于具体城市发展模式中。20世纪20—30年

代“助推主义”于洛杉矶盛行,主席格兰德在内多数1932奥运会组委会成员均为城市助推领袖。柏林举办1936奥运会受“伪古典主义”渗透,20世纪初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城市出现这一建设热潮,1936奥运会主体育场等均为代表性建筑。该阶段开始不同、更迭的城市发展模式反映出城市发展趋势,影响城市办奥思路和实践,清晰、深刻地烙印在其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的后续阶段,影响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此时,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对奥运城市发展的影响开始从促进体育传播、普及奥林匹克思想,走向对城市其他领域产生初步影响,多维奥运遗产客观上开始拓展。1932奥运会留下纪念体育场等物质遗产、南加州奥林匹克委员会等组织遗产,精神遗产也不可忽视:洛杉矶获1984奥运会举办权前参与了二战后每届奥运会申办,包括向国际奥委会申请、参与美国国内候选及代表美国参加国际候选。1936奥运会后柏林有了牢固、经典的体育综合体,组织经验为1972奥运会奠基,柏林墙倒后其立即申办2000奥运会。然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对奥运城市发展产生影响的潜在能量此时及随后相当长时间受到牵制:与奥运城市发展相联系无法避免地涉及物质建设、拉动经济等议题,而追求纯洁性和关注体育使奥林匹克运动不以对奥运城市发展产生专门影响为主要目标。

1.2 二战后至20世纪末:全球城市蓬勃发展和奥林匹克运动快速发展互动

1)阶段四(第14~16届奥运会):在“过渡”中互动。

第14~16届奥运会于1948、1952、1956年在伦敦、赫尔辛基和墨尔本举办。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因二战中断的互动关系重新维系,3届奥运会顺利举办证明两者互动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

战后百废待兴,城市办奥量力而行。在举办地及其国家支持下,因战争陷入险境的奥林匹克运动渡过了难关。伦敦未新建场馆和奥运村,设施多以支援城市重建名义向私人或社团征用,或以较少租赁费用和赛后利润分配、弥补损失为条件借调。芬兰因二战斡旋于苏、德间受到惩罚,多改造战前为申奥准备的设施。澳大利亚战后政局不稳,公共支出受限,墨尔本升级市中心已有条件尚好的设施服务办奥,1952、1956奥运会虽产生一些新体育设施但数量少。该阶段办奥水平较之前无明显提升,办奥即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支持。

二战使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受到打击,1945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隆重启执委会时仅英、美委员回应,然而奥林匹克运动很快浴火重生。一方面,其发展抚慰城市创伤:战后精神、道德重生面临考验,3届奥运会开幕前民众追随火炬手奔跑欢呼展示其深受

奥运精神激励；另一方面，其发展促进城市重建：战后伦敦转型，英国业余田径委员会秘书克鲁普认为伦敦人受益并看到世界变化^[9]；赫尔辛基战前已从申奥准备中获得改变，战后积极办奥加速建设；墨尔本所拥有的澳大利亚重要城市的地位，与历史上当地出现的3次城市增长浪潮有关：第一次是1850年代淘金热催生的“新金山”建设，第二次是1880年代世博会带来的“土地繁荣”，第三次则是1950年代因办奥而打造“体育之都”。奥林匹克运动生生不息。

2)阶段五(第17~22届奥运会):在“矛盾”中互动。

第17~22届奥运会于1960、1964、1968、1972、1976、1980年在罗马、东京、墨西哥、慕尼黑、蒙特利尔及莫斯科举办。这一阶段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广度、力度、深度较之前有较大、较剧烈提升，同时矛盾也在凸显。

一方面，奥运城市发展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产生影响。首先，20世纪60年代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工业惯性和投资，城市发展持续繁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产生建设愿望。随之，“福特主义”不同程度渗入办奥认识与实践。福特主义因将装配线用于生产的企业家亨利·福特得名，两次工业革命后大批量、大规模和标准化生产成为必然，城市发展经历类似：原先“生长”缓慢、自然，奉行福特主义后，在政治、资本等裹挟下，“旧的、自建的、自然和人性化的生长方式不被宽容”^{[8]433}，大刀阔斧的城市建设受推崇。福特主义符合人口速增需求，推动基础设施积累，赋予城市新面貌，在传统现代化思维里等于人民利益^{[9]151}，60年代起城市办奥发起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广度、力度、深度较之前变化显著。然而，城市盲目遍行福特主义产生士绅化、土地投机和贫富差距等问题，导致对城市内在文化、社会等非物质领域缺乏关注，同样办奥发起的激情建设中不少工程耗资过量、远超需求、施工维护难度大，“非建设”问题也不在少数：东京1964奥运会筹备时为方便动工，当局突然提税并雇佣日本黑帮“雅库扎”驱赶市民；墨西哥城1968奥运会组织者在贫民窟墙壁涂满色彩掩饰残破。其次，经济危机中救市、世界战争中救援——以及政治对立、民族主义迸发等因素，使20世纪60年代后国家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管理、土地开发等事务，国家在城市发展中角色活跃起来，办奥同样如是：国家将之与主权巩固、形象强化、民族团结等结合，以达成国家目的、表达国家诉求、附和于国家利益。不同级别政治力量，如国家和城市，其介入办奥的优先顺序、出发点和落脚点时而一致时而不同，如1968奥运会前总统倡导新建地铁，但墨西哥城市政府并不主张，随后原市长被

迫辞职，总统好友、新市长推行地铁建设。该阶段奥运会关联的国家政治目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宏大叙事是奥运史上欧美城市办奥中较持续、完整和明显的时期。最后，20世纪70年代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发展出现“新陈代谢”的阵痛：制造业衰退，生产率下降，新技术投资和产出减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城市发展路向调整，反思过度建设。因未处理好城市建设与民生、环境等领域协调发展的关系，反对办奥的市民运动开始出现。近代自治城市衰微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经过绝对君权时期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懒散市政、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精英治市，再到信赖国家和城市当局承诺，市民历经长时间的权力委托，当出现种种有悖公平正义、人性关怀的问题，公民社会逐渐回归，人们要对城市发展、办奥有更多话语权。20世纪70年代末，因上述多种原因，城市对办奥从趋之若鹜变为退避三舍，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亮起红灯。

另一方面，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对奥运城市发展也产生影响。这一阶段城市明确开始将办奥视作发展助推器，奥林匹克运动强影响力已经彰显：一是对奥运城市物质扩充产生较大影响。奥运城市均新建设计、风格、结构更现代的场馆和设施，水准一流，赛后许多场馆——尤其体量适度、合理的场馆——持续发挥作用，成为光荣的城市地标、活态的历史诉说者和奥林匹克经历的永久象征；二是对奥运城市广泛规划产生较大影响。城市纷纷将办奥纳入整体规划，从局部区域扩展到整个城市；三是对奥运城市系统升级产生较大影响。城市因办奥延伸的实践涵盖交通、绿化、立法、卫生、文化教育和遗迹保护等。此外，办奥为城市发展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想争锋提供了平台，两者联系与冲突随之展现，持续至今。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化母胎，建设性与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强调寻求解决办法。20世纪60年代末，尤其欧美发达国家，均一化、普遍化社会基础被打破，后现代主义蔓延到民众对城市发展的思考中，人们以批判、存疑、解构的视角，强调多元性、差异性，文化和思想平等及自由发展。伴随城市发展中的后现代主义，后奥林匹克主义也得到发展，20世纪70—80年代后，借奥运为平台人们表达着对现代化、工业化城市走向异化的批判。需要注意的是，当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愈发剧烈时，国际奥委会守旧、与时代脱节却抑制了这一进程。“那个年代国际奥委会反对办奥花费中包括重大城市改善”^[10]。墨西哥城1968奥运会前，国际奥委会督促场馆建成，而在市民因办奥掩盖政治、军事矛盾发起抗议后，国际奥委会却要求墨西哥城保

证不再发生不光彩之事;蒙特利尔1976奥运会前,国际奥委会忌惮慕尼黑惨案类似事件发生,不同意奥运村分散建设,要求将数量庞大的选手集中,忽视城市建设成本。彼时,国际奥委会对战后社会各领域深刻变化和20世纪60年代后奥运会大型化、综合化和社会化新趋势缺乏及时、足够的认识,对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的理解也落后于现实。

3)阶段六(第23~26届奥运会):在“利益”中互动。

第23~26届奥运会于1984、1988、1992、1996年在洛杉矶、首尔、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举办。这一阶段起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形成依赖性互动关系:城市发展摆脱困境的需求和不断加深的全球化趋势催生其发展新变化,城市再视办奥为机遇;国际奥委会以奥运会商业化为重点展开改革,正式认可城市借办奥促进发展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的事实。

从奥运城市发展影响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角度来看,首先,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后福特主义”城市发展模式流行,强调新经济(金融、信息、文化、体育等)满足新需求,从物质建设无休止转为城市中心和“棕地”(存在污染的工业用地或废弃用地)的再开发,促进城市更新:既有老旧物质环境更换,也涉及提升健康、教育和社区凝聚力等^[11]。国际大型赛事被认为与后福特主义的、去工业化的城市更新有关,商业化改革后奥运会被视为选择:既与新经济挂钩,又吸引全球投资、创造服务岗位,方便重建。1957—1973年巴塞罗那大都会计划具有福特主义特征,消极影响引发过抗议,随后该市启动城市更新,办奥是关键。首尔办奥也与城市更新相关,定位是商业、金融、信息、文化产业发达,辐射东亚和影响世界。办奥同样在亚特兰大城市更新布局中,赛前该市与其他美国区域城市一样转型,申奥目标之一是弥补文化、知名度等劣势,不被看作只做生意的城市^[12]。后福特主义下的城市更新,使办奥热度提升。然而,城市办奥若过度偏重经济利益、优先服务资本力量则导致奥运会过度商业化,激化社会矛盾,奥林匹克品牌一道背锅。其次,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许多城市赶超势头强,欧美城市长期独领风骚的局面被扭转,越多城市争夺资本、人才和影响力等资源,全球范围内城市展开竞争。80年代后许多城市政府报告频繁出现强化全球定位的表述,而该阶段起奥运官方报告出现大篇城市“自我介绍”,如1988、1992奥运官方报告该内容多达32、64页。奥运会等大型赛事具有的种种特征,如吸引全球关注、构建全球联系、提供国际标准等被视为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助力。过去城市增加国际知名度的理念与实践较为朴直,如依靠媒体宣传、增加相关活动

和依仗意见领袖等,而全球化下城市回应竞争采取了更清晰、专业、系统的策略:政策导向支持、众多领域串联、团队设计开发等,趋于大型管理项目,办奥被视为重要步骤。1981年当选的新市长、申奥促成安安德鲁执任目标是让亚特兰大向国际城市转变^[13];巴塞罗那市议会筹备奥运会时成立国际关系部,寻求在欧洲、拉美、地中海保持优势的同时,在国际组织树立积极形象^[13]。全球化加剧城市竞争,办奥具备更大“市场需求”。最后,这一阶段开始,新公共管理思想激励下的城市治理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产生影响。传统公共行政中政府或新授权机构直接服务,公共政策与行政执行政治单一目标,公民参与度有限,80年代前城市办奥不同程度体现这些特征。80年代后西方国家政府重塑运动兴起并向全球蔓延,传统政府管理体制变革,从管理公共事务为中心变为提升竞争力、减少财政负担为中心,政府放松管制,授权和委托服务,激励私人部门、社会力量等共促发展。70年代末一些城市向国际奥委会提议应从私人部门获得办奥资金,凭城市、国家公共财政难以维持花费。该阶段开始因奥运会商业化改革和获国际奥委会允许,城市开始委托私人部门承担奥运大量组织工作,如1984奥运会麦当劳赞助建设游泳馆、南方公司赞助建设自行车场等。新公共管理思想激励下城市看待大型事件视角转变,自主性增强,影响其申奥、办奥和赛后遗产运营,为奥运会运作探索了路径。

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影响奥运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奥运会商业化改革对奥林匹克运动、城市发展及两者互动影响深远。首先奥运会性质不再单一,电视媒介和商业伙伴支持下,从国际大型赛事成为数十亿人次观看的电视节目和高商业价值项目,新申奥浪潮高涨;其次奥林匹克运动适应性、灵活性、领导力、团结力增强,与各界多种多面互动,改变城市办赛模式,满足城市多维需求,促进城市发展方式调整,其积极变化为城市办奥、发展及与之互动提供有利因素;最后国际奥委会能量膨胀:从以往常亏损变为90年代末收入高达40亿美元,权威大增,有余力推动城市发展。该阶段起国际奥委会态度变被动为主动,鼓励城市将办奥作为发展引擎,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成就。经济学角度看,国际奥委会交付奥运会这一产品并发挥其商业价值,需奥运城市共同完成。若举办地基础设施无法跟上、通信设施差强人意、装饰布局缺乏亮点,则影响观奥体验、版权销售、商业投资和关系维系。值得一提的是,奥运会商业化改革后商业赞助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法律合同的形成使奥林匹克运动利益相关者网络重新调整,承认办奥中多

方利益追逐与斗争从此合法正当,办奥除叠加举办城市、国家需求和目的外,还牵涉其他方需求和目的。一方面这使更多、更强力量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推广和城市申奥、办奥及发展,另一方面当利益、需求和目的优先顺序不同、彼此冲突难调和时,对城市办奥及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一些学者指出风险:“奥运城市选择不再基于奥林匹克核心价值,而是满足奥运会现有消费者增加更多财富的条件”^[13]“最大获益者可能是国际奥委会长期合作伙伴而非奥运城市”^[14]“奥运会商业化给奥运城市带来利益时也让其受到掣肘”^{[17]200}。不过,奥林匹克运动组织制度体系积弊对奥运城市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1984奥运会后申奥热度攀升^[15],缺乏严格规范的遴选流程使一些国际奥委会委员与申办城市“自由发挥”:“城市奥申委诱惑委员接受与申办不相干的好处,委员索取与职责无关的利益,这是随时引爆的炸弹”^[16]。布茨收集巴塞罗那、亚特兰大、悉尼、盐湖城等资料后发现,迎合委员反倒成为取胜诀窍,悉尼当选后申奥官员坦露过程让其压抑、不快和尊严受损。90年代末多座失利城市对申奥程序不满但没引起国际奥委会重视,盐湖城丑闻曝光后前者要求后者赔偿损失,认为其纵容不公正、不透明操作,使城市和国家资源浪费、蒙受欺骗。彼时国际奥委会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未进行根本转变和战略规划,在委员管理(代表性、身份、权责等)、城市遴选(标准与程序、交流与访问等)、自治善治(民主程度等)等方面存在问题,影响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全局,包括与奥运城市互动。

1.3 21世纪: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互动

阶段七(第27届奥运会至今):在“改革”中互动。第27~32届奥运会于2000、2004、2008、2012、2016、2020年在悉尼、雅典、北京、伦敦、里约热内卢和东京举办。这一阶段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开始形成互动机制。奥运城市、奥林匹克运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有意识地使自身发展及影响对方发展的过程在引导、干预下更有效、更积极、更合理和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利益。两者不仅重视彼此影响,更强调如何产生好的影响,即管理、构建影响,互动从“面全”向“质高”升华。

奥运城市希望通过可持续发展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首先,奥运城市支持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奥运城市需奥林匹克运动回应其可持续发展诉求^[17],达成该目标需要奥林匹克运动自身可持续发展,积极转变:“过去申奥像申请特许经营权一样竞争激烈,现在要问申办、举办城市如何

才使奥运会符合其发展的长期需要?”^[18]。其次,奥运城市助力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层次的完善。一是支持奥运会交付,利于奥林匹克运动活动体系可持续发展,如疫情下兑现办奥承诺;二是支持国际奥委会高效善治,利于奥林匹克运动组织制度体系可持续发展,如奥运城市通过世界奥运城市联盟会议向国际奥委会提供意见和建议;三是支持奥林匹克运动广泛传播与长久传承,利于奥林匹克运动自身可持续发展,如近年来奥运城市普遍将可持续性纳入办奥全程,并在后奥运时期与国际奥委会分享可持续发展和遗产管理经验。最后,奥运城市推进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实践的优化。一方面,奥运城市形成共同体,强化其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作用。例如世界奥运城市联盟由曾举办、正筹办和申办奥林匹克赛事或对此感兴趣的的城市组成,宗旨是与国际奥委会合作、为申奥和办奥城市提供平台、研究奥运赛事对城市的影响、推动奥运城市成为世界体育文化和国际发展中心等。另一方面,奥运城市在敢为、创新中使奥林匹克运动受益。奥运会实施标准化受奥运城市启迪:“伦敦2012奥运会为可持续发展管理提供灵感”^[19]。奥林匹克知识管理与传递机制与奥运城市提议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奥委会与悉尼2000奥运会组委会共同发起”^[20]。申办程序改进也与奥运城市紧密联系:国际奥委会2000改革对申办程序调整的压力可溯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奥运城市、落选的申奥城市对旧申办程序的意见,而《奥林匹克2020议程》等文本也征求奥运城市的建议。

奥林匹克运动也在可持续发展中为奥运城市带来了积极影响。首先,国际奥委会调整发展思路,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对奥运城市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近年来国际奥委会关于奥运城市的定位逐渐明确:赛事交付者、遗产开发者、改革推动者。国际奥委会认为奥林匹克运动对奥运城市发展有责任、有条件产生积极影响。2003年《奥林匹克宪章》首次提出使奥运会给举办城市及国家留下积极遗产;《奥林匹克2020议程》强调实施以可持续性、可行性为核心的办奥理念,让奥运会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催化剂;《奥林匹克2020议程:新规范》强调为城市设计奥运会以实现长期发展目标提供更大灵活性,确保其从国际奥委会和广泛的奥林匹克运动中获得更多援助。其次,国际奥委会构建多种机制,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对奥运城市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一是改革申办程序。自2000改革以来申办程序不断调整以适应城市办奥和发展需要。二是规范举办合同。除了在可持续发展、传承遗产、维护人权等方面做出更多、更细的要求之外,举

办城市奥组委及国家奥委会完成办赛义务的前提下,国际奥委会承诺将提供好处和方便,美其名曰“作出贡献”,该部分内容从数额不清到福利加码。三是搭建专门委员会。未来举办地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等作为专业领域代表指导、监督和评估城市交付赛事及发展。四是开展奥运影响研究。2003年起国际奥委会与奥运城市、学界等合作发起“奥运会全球影响研究”(后为“奥运会影响研究”),目前建立于《奥运会可持续性报告》所获经验和新遗产报告框架下形成的“奥运遗产报告”将之替代,帮助奥运城市管理奥运影响。五是构建知识管理体系。旨在提供平台,使信息、服务和经验在奥运城市间迁移,《奥林匹克2020议程》下该体系升级:新“奥运会管理2020”中“奥运会学习模式”助力城市办奥、发展。六是国际奥委会支持多方行动,促使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对奥运城市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除赛事外,国际奥委会日益重视其他奥林匹克运动有关活动的价值,姿态主动,投入坚定,方式全面,以加强各领域和事务中的作为。为使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促进奥运城市发展,国际奥委会发起、支持的计划种类繁多,常推常新,适用范围、对象不限于奥运城市但均催化奥林匹克运动为其留下遗产,包括积极城市计划等。这些活动从奥林匹克价值观出发,以体育为手段,体现奥林匹克运动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角色。

2 关系博弈:互动中的“明线”与“暗线”

历史推进仿若“线条”延伸。在前文剖析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百年互动脉络的基础上,一方面需高度总结以便把握位于“明处”、彰明较著的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中矛盾的变化——即两者话语权力的此消彼长;另一方面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并非“真空”下进行,场域中其他成对博弈关系位于“暗处”、伏绕其中,例如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城市,它们之间矛盾的较量证明了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2.1 “明线”: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话语权力的消长

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演进中存在两者办奥话语权归属的不断变化。早期奥运城市拥有的话语权强于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奥委会要求有限,城市只需表明申奥兴趣”^[21],在国际奥委会疲于发展体系初步构建、难以提供办奥成熟机制和各国政府不重视之下,办奥具体工作主要依靠奥运城市摸索、积累,奥运城市对奥林匹克运动夯实根基发挥了作用。

随着奥运会体量变大、奥林匹克运动影响力提升,其叠加价值被城市察觉,申奥城市增多,第11届奥运

会(1936年)有12座城市申请。热情未因二战浇灭——第14、15、16届奥运会(1948、1952、1956年)有7、8、9座城市申办。至第21届奥运会(1976年),申奥城市数量充足、稳定。由于申奥城市变多,国际奥委会开始要求提供较全面信息以评估办奥可能,话语权天平逐渐向奥林匹克运动倾斜,但并未过多影响奥运城市突出地位,办赛与建设如火如荼。

20世纪70年代后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走向密切的同时,一系列问题因逐渐黏合的利益、逐渐激化的矛盾在办奥中浮现,包括物质领域建设豪掷与非物质领域建设缺位、美化运动追求外在而市民运动追求内在等,加之时代背景中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减速等催化,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由热趋冷,至第23届奥运会申办时仅剩洛杉矶响应,来自奥运城市及国际体育组织等方面的压力使国际奥委会须以改革面对,此时奥运城市掌握更多话语权。

洛杉矶1984奥运会获利宣告奥运会商业化运作启动,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掀开新篇章。第24届(1988年)到第28届(2004年)奥运会,申奥城市数量攀升,第28届奥运会申奥城市有11座,激烈竞争导致奥运城市放低姿态,国际奥委会对此推波助澜、加剧奥运城市间倾轧,不可谓不高高在上。此外,国际奥委会已通过初步改革将原先有关奥林匹克标志、奥运会媒介版权等方面分散的权力从奥运城市手中收回,包括奥运城市在内,多方置于主要由国际奥委会重新编制的利益网格和制度机制框架中,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中后者话语权增加。

然而,国际奥委会、奥运城市在内的“奥林匹克利益联盟”缔造奥运会宏伟、绚丽奇观的过程中,其大规模、高标准、严要求让奥运城市“超量负荷”,办奥再成烫手山芋。为此,国际奥委会陆续颁布有关申办程序、可持续性奥运会、增强奥林匹克社会性的改革文本,旨在扭转颓势,为观望的城市分发定心丸,奥运城市话语权再次得到重视。虽国际奥委会有了让步,但其优化奥运城市实际收益和无形效益的空间还很大。未来“抢话”不如“对话”,不平等、偏利失衡的互动背离可持续原则,共同服务人的至善与世界的至美,寻求办奥最佳解法,才是两者相处之道。

2.2 “暗线”: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城市优先位置的更替

1932、1936奥运会后政治、经济目的逐渐介入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中,围绕办奥其优先位置发生了变化。二战前后到80年代前,政治目的之干预强于经济目的,尤其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几届奥运会,无不掺杂复杂的政治目的。赢得国际声望、塑造强大形象、增强民族凝聚力、推进现代化等目标普

遍有之,特殊政治目的也可窥探:强调与辉煌古罗马帝国的联系(罗马1960奥运会),洗刷战争耻辱并摆脱奥林匹克语境中低人一等的身份(罗马1960奥运会、东京1964奥运会),模仿发达榜样寻求美、英认可(罗马1960奥运会、东京1964奥运会、墨西哥城1968奥运会、慕尼黑1972奥运会),确立发展中国家佼佼者地位(墨西哥城1968奥运会)、暗示与法西斯及东德划清界限(慕尼黑1972奥运会)等。此时,主要是举办城市奥组委、举办国家奥委会与一些企业合作,力度温和。80年代至今,经济目的之考量强于政治目的。曾长期担任国际奥委会执委的霍德勒认为70年代末低迷的申奥趋势在其他城市目睹1984奥运会盈利后重现高潮,反映出办奥多种需求中经济发展的突出地位:“对后洛杉矶时代奥运组织方来说,重点移到商业、企业发展和潜在巨额利润”^[2]。亚特兰大1996奥运会交由私人运作后“金钱至上”、申奥竞标白热化下城市不惜重金贿选等。此时政治力量由台前走向幕后但并未退场,表面政治纷争在奥运赛场上相对减少,但政治表达却依然以精妙方式存在,如开幕式文化输出、媒体偏向性解说、舆论打压等。芒福德认为政治、经济目的在人类历史各时代均以不同表现形式存在,无论意识形态或理念目标差异几何:“开始它们松散地联系,最后在城市环境下携手共进……占支配地位的世界都市都是政治、经济力量的大量集中”^{[8]539}。政治、经济目的媾和与斗争,同样在奥林匹克运动、奥运城市发展互动中不断上演。

贝瑞^[2]认为“城市是(国家)城市体系中的体系”。国家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如左右城市发展“地理-社会”模式是中心地模式还是网络模式、左右城市行政管理模式是自上而下垂直结构还是主要依靠市民自治的扁平结构,进而国家与城市的关系影响办奥思路与实践。因自然基础、历史条件、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传统等差异,奥运会背后反映的国家与城市关系各有不同。城市与国家可以利益结合,如过去赫尔辛基与芬兰举办1956奥运会目标一致,现在北京与中国协力奉上2008奥运会。在一些情况下也有分歧,如过去墨西哥政府与墨西哥城市政府围绕1968奥运会地铁建设意见不合,现在德国联邦政府拒绝汉堡提出的资金分配方案是后者退出2024奥运会申办的原因之一。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中,早期城市相关组织方(奥申委、奥组委、市政府、市民及当地精英人士)发挥的重要作用高于国家,20世纪初许多国家还未专门发起“国家队”参加奥运会而该工作主要由前往举办地的该国选手、体育协会自发组织,遑论这些国家将办奥视作抱负实现的工具。然而,20世纪30—70

年代末,办奥中国国家主导痕迹明显。80年代后,世界多极化、区域一体化、经济和文化等全球化趋势,加之人口跨国流动和身份混杂、社会异质性增大、社区与市民意识增强、后国家概念兴起等因素,国家与城市关系逐渐调整,国家逐渐下放、授予城市更多权力,城市自身发展与地方政府主动性、自主性得到更多释放,城市获得更多发展空间和条件。一方面,城市寻求超越国家的发展机会,一些超大城市、城市群逐渐具备影响国际事务的实力;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实际生活的共同体,城市能更直接、有效地塑造以人为本的生活。21世纪是城市世纪,然而将办奥作为国家实力、全球领导力展示途径依旧是不变诉求。

围绕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未来或可展望5方面选题:一是奥运城市基本理论问题。奥运城市应是怎样的城市?与体育城市间关系如何?“一朝是奥运城市,永远是奥运城市”如何实现?二是本研究以夏奥会举办城市为例观察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从冬奥会、青奥会举办城市来看,互动又将如何?3类互动有何共同结论归纳?有何不同特点总结?三是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基本思路下,除“纵向”历史演进,其他各角度“变化”也应追踪,如申办、筹办、举办及后奥运阶段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如何互动;四是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中的关系博弈不仅存在于两者及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城市之间,更多成对关系也在博弈,有待挖掘。五是基于对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历史流变的观察,后续不同城市如何选择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的方式;下座中国奥运城市应如何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均可思考。

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3时期、7阶段中,经历“接触”“互动”“依赖性互动”与“形成互动机制”的层次渐变,互动广度逐渐拓展,高度逐渐提升,深度逐渐推进,“温度”逐渐凸显,彼此影响互相转化。其中,既可以观察到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话语权的消长,也可以观察到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城市优先位置的更替。互动,是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向前发展的动力,唯有长期地、普遍地、积极地、均衡地、平等地互动,奥运城市、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才能符合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才能留下人类文明的持续遗产。

参考文献:

- [1] 刘新成. 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J]. 历史研究, 2013(1): 4-10.
- [2] 夏继果. 全球史研究:互动、比较、建构[J]. 史学

- 理论研究, 2016(3): 118-125.
- [3] BECK, PETER J. Britain and the Olympic Games: London 1908, 1948, 2012[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2, 39(1): 21-43.
- [4] WESTERBEEK H M. The Amsterdam Olympic Games of 1928 and 2028: Will city heritage in-form legacy intent?[J]. Sport in Society, 2009, 12(6): 776-791.
- [5] 皮埃尔·德·顾拜旦. 奥林匹克回忆录[M]. 刘汉全, 译.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8: 170.
- [6] WHITE J. The Los Angeles way of doing things: The Olympic Village and the practice of bo-osterism in 1932[J]. Olympik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lympic Studies, 2003, 6: 79-116.
- [7] 任海, 崔乐泉, 孙葆丽, 等. 奥林匹克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8.
- [8]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 [9] 张京祥.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7: 151.
- [10] PITTS A, LIAO H W. Sustainable Olympic design and urban development[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4.
- [11] 方可. 西方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J]. 城市规划汇刊, 1998(1): 3-5.
- [12] WHITELEGG, DREW. Going for gold: Atlanta's bid for fam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0, 24(4): 801-817.
- [13] ZAMORANO M M, MORATO A R. The cultural paradiplo-macy of Barcelona since the 1980s: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local cultural paradiploma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15, 21(5): 554-576.
- [14] CHOI CHEONG RAK, CHUL MOO HEO. Economic changes resulting from Seoul 1988: Implications for London 2012 and future game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13, 30(15): 1854-1866.
- [15] 王润斌, 贺冬婉. 当代奥林匹克危机的历史变奏与治理之道——罗伯特·巴尼教授访谈录[J]. 体育学刊, 2020, 27(2): 1-7.
- [16] 理查德·W·庞德. 奥林匹克内幕[M]. 屠国元, 马新国, 汪碧辉,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 200.
- [17] 黄璐, 刘波. 奥林匹克运动改革的新趋势与新路径研究[J]. 体育学刊, 2022, 29(3): 19-25.
- [18] IOC. President Bach guest of Paris mayor Anne Hidalgo - addresses world mayors at climate confer-ence [EB/OL]. (2017-10-23) [2022-10-17] <https://olympics.com/ioc/news/president-bach-guest-of-paris-mayor-anne-hidalgo-addresses-world-mayors-at-climate-conference>
- [19] KIM, HYUN-DUCK. The 2012 London Olympics: Commercial partner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outlining the implication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13, 30(18): 2197-2208.
- [20] JOHN R G, MAGARENT M G. Olympic cities: City agendas, planning and the world' s games (1896-2020)[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29.
- [21] IOC. Candidatures files for the Olympic Games[EB/OL]. [2022-10-17]. https://library.olympics.com/default/candidatures.aspx?_lg=en-GB
- [22] ROBERT K B. Selling the five rings: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the rise of Olympic commercialism[M].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4: 1-4.
- [23] BERRY B J L. City siz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64, 13: 147-163.